



晚清皇族困局

恭亲王孙女重说近代史

爱新觉罗·恒铃◎著



**一部恭亲王家族视角下的晚清史
记录末代王朝皇室的彷徨与挣扎**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晚清皇族困局

恭亲王孙女重说近代史

爱新觉罗·恒铃◎著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晚清皇族困局：恭亲王孙女重说近代史 / 爱新觉罗·

恒铃著. 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9.5

ISBN 978-7-5205-1049-3

I. ①晚… II. ①爱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清后期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52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051828号

责任编辑：张春霞 牛梦岳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 邮编：100142

电 话：010-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-81136655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：18

字 数：249千字

版 次：2019年8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：201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59.80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谨以此书献给高祖恭忠亲王

序言一

爱新觉罗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我不可能认得其中所有的成员。所以说，两个人相识是要靠缘分的，即便是同宗同族也不例外。

我认识恒铃是在二十多年前。她是恭亲王奕訢之后裔，那时候她叫毓鸿，是一名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，正在拍摄爱新觉罗家族的故事。听到她的名字，起初还以为她比我大两辈，后来才知道她其实是“恒”字辈，就算这样，还是比我要大一辈。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讲究了，随着时间推移和家族的繁衍，辈分和年岁都相差很大，因为我的年龄只比恒铃的父亲小两岁，所以她坚持称呼我为先生。前年4月，恒铃正式拜我为师学习书法，先生这个名头更是拿不掉了。

现在，恒铃由一个纪录片导演变成了学者，研究起了清史，写起了家族史的书籍，我由衷地为她、也为这个家族感到高兴。爱新觉罗家族不乏书画名家，但专注于历史研究的却是凤毛麟角。

恒铃的第一本书出版在即，她请我为她的书写几句话。这让我想起了1998年，我的第一次个人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，当时启功大哥在开

幕式上说：“启骧，我们是一家的。在这里我只是代表他，请大家多提意见。”这句话我现在拿来放这儿说也挺合适。

“恒钤，我们是一家的，在这里我代表她请大家多提意见。”另外，也希望恒钤在勤练书法的同时，能沿着历史研究的这条路一直走下去，发表更多的作品，传承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。

爱新觉罗·启骧

2019年3月25日于柳荫轩

序言二

2018年仲秋，我以澳大利亚企业家及独立学者的身份单独到访华盛顿，有机会与一群美利坚的“离退休老干部们”一一进行了交流。他们都是曾经的风云人物，且至今仍在美国商界、政界、军界乃至情报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

我们当然都谈及了中美关系。

我重点谈了19世纪50年代以来，以林肯政府的国务卿西华德（William Henry Seward）为代表的美国政界精英，制定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，实际上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1.0版本。这一政策甚至精确地预见到了百年之后的美俄关系。

在中国方面，与西华德等人相呼应、奠定了中美关系中方根基的，就是当时年轻的执政者恭亲王爱新觉罗·奕訢。他曾亲自会见了第一个访华的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（1871年访华）及美国前总统格兰特

(Ulysses Simpson Grant, 1879 年访华)。甚至,在他主导下,中国政府还“返聘”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(Anson Burlingame)在其卸任后出任全权使节(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),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、英、法、普、俄诸国。

凡此种种,都推动了中美之间“合作政策”的顺利推行,美国因此成为近代史上对华最为友好、最为亲密的国家——没有“之一”。

美国的老干部们几乎从未听过这些故事。他们听得津津有味,除了建议我可以去美国军校讲课之外,也表示了对那位他们此前从未听闻的“中国前领导人恭亲王”的极大兴趣,表示今后有机会一定要去瞻仰北京的恭王府。

二

在 2017 年回归商界之前,我有足足 8 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讲学、考察、周游,几乎每到一地,都会大力推介恭亲王。

本书的作者——爱新觉罗·恒铃(毓鸿)女士,就是恭亲王的第五代孙女。我平日都喊她“格格”。

我与格格相识,是通过她的大爷(大伯)爱新觉罗·毓蟾先生。毓蟾先生比我足足年长 47 岁,我们是忘年交。

第一次见毓蟾先生是 2010 年 10 月,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会同文汇出版社,在恭王府内为我的改革史新著《绝版恭亲王》举办发布会暨恭亲王研究座谈会,来了不少清史专家。毓蟾先生那年已经 87 岁高龄,在发言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,非要给我鞠躬,说要感谢我给他们家“平反”了,令我颇为惶恐。

纵观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,被认为是“胡人”政权的,一是元,二就是清(唐朝的李氏家族虽非汉人,但一般不将其视为“胡人”)。元代在中原仅仅生存了 97 年,因此,朱元璋的那句可怕咒语——“胡人自古无

百年运”，一直都成为清王朝历任帝王的压力与动力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，清代国祚达二百六十余年。无论如何评价，这个王朝的确将“资治通鉴”做到了极致，清代诸帝的德能勤绩在历代王朝中堪称翘楚。在晚清的50年，以恭亲王为核心，包括著名的曾（曾国藩）、左（左宗棠）、李（李鸿章）等，体制内集聚了大量精英，其表现相当夺目。晚清50年的改革，不仅奠基了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基础，更给中华民族的发展展现了巨大的想象空间。

自辛亥革命以来，无论政界还是学界，对前清末期的评价都很低，甚至十分贬斥。我在拙著《绝版恭亲王》中提出，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，中国改革其实是一个延续、连贯的整体。恭亲王奕訢作为中国150年改革开放的奠基人，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被长期矮化和忽视。他几乎一手导演了晚清第一轮“改革开放”（洋务运动），使本已痼疾缠身的王朝出现了“同光中兴”。那些被后世景仰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，其实只是改革的桨手而已，恭亲王才是真正的掌舵人。恭亲王的改革思路、策略、技巧，成为晚清乃至后世改革的重要借鉴。

恭亲王在改革初期，面对内忧外患，积极扩大执政基础，勇于并且巧妙地突破祖宗成法，使得一大批汉族官员及外聘的洋干部，在挽救危机、提升执政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经历了20多年的外患之后，恭亲王开始探索新的外交体制，从东亚的宗藩体制走向全面的条约体制，为中国争取到了3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，并对之后的中国和整个世界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西方外交官、记者、传教士均留下了大量涉及恭亲王的史料，在英、法、美等国的官方文献，如议会辩论记录、外交报告中，也有大量涉及恭亲王的内容，恭亲王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，成为世界了解和解读中国的窗口。

因现实政争的需要，自从慈禧太后独立掌舵后，恭亲王的历史地位就受到长期人为的矮化、淡化及边缘化。进入民国之后，随着整个晚清历史

被纳入国民党党史话语体系，恭亲王的历史作用更被忽视。至今，作为唯一对外开放的王府，恭王府所接待的绝大多数游客，只是将此作为和珅的故居，而极少关注其影响及于今日的恭亲王。

当时参与研讨会的专家也都认为，恭亲王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，我们应大力挖掘恭亲王在中国改革史中的经验和智慧，为当下的改革提供历史镜鉴。

三

毓蟾先生可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普通一员，他是第三任、也是末任恭亲王。

末代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中是这样说的：“小固（毓蟾）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，溥伟去世后，我以大清皇帝的身份赐他袭爵，把他当作未来‘中兴’的骨干培养，他也以此为终身志愿……”

那是1936年，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宫缉熙楼书斋，赐毓蟾袭世袭罔替的恭亲王爵，同时把恭亲王溥伟去世后上缴的三件传家宝，即大阅御用紫宝石腰带、咸丰皇帝亲书朱笔密谕、白虹刀，都赏还给他。

毓蟾先生虽为末任恭亲王，却从未在王府内住过一天，甚至，他对王府的熟悉程度也远比不上恭王府管理中心的导游们。与辉煌的祖先相比，毓蟾先生的一生相当不幸，被政治的旋涡卷滚着，无法自主，即便在溥仪“御前”伺候的那些年，也是颠沛动荡、担惊受怕，甚至不时要为自己的生命安危而担忧。

我后来几次与毓蟾先生畅谈，他都会仰天长叹，虽未明言，“不该生于帝王家”的无奈与无助却相当强烈，每每令我感慨万千。

四

其实，与国史上大多数朝代或其他国家的末世皇族相比，爱新觉罗家族还是相当幸运的。

当恭亲王开创的晚清改革走到尽头时，“下岗”了的清朝皇族却成功地实现“软着陆”，全身而退，创造了历史奇迹。古今中外，皇帝这个金领职业莫不伴随着巨大风险，而“下岗”皇帝的命运一般只有一个默认选项：斩草除根。在高喊进步、自由的共和狂飙中，包括法兰西、英格兰等国的君主，其曾经高贵的头颅都被以人民的名义切下；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则更是被灭门焚尸。“最恨生在帝王家”的感慨，超越了种族和国界。只有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一个例外。

这个家族最后的当家人、摄政王、溥仪之生父爱新觉罗·载沣，于26岁时接过王朝的巨舵，安然度过了疾风暴雨的革命。载沣最为人诟病的所谓“软弱”，恰恰是其宽容、开明的表现。在党争严峻、派系林立的大清朝廷中，“软弱”的载沣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。而即使面对着政治上的死敌，载沣也用自己的宽容为国家减少了一点戾气，为皇族留下了一点退路。

1909年，在处理袁世凯这样的权臣时，他相当技巧地给老袁和自己留下了转圜的余地。三年后，如果没有老袁这道宏伟的拦洪坝，爱新觉罗家甚至连和革命党讨价还价的砝码都不够。

1910年，载沣在另一件关系其自身安危的大事中，再度展现了宽广的政治胸襟。一位名叫汪兆铭的革命党人，和载沣同龄，使用炸弹谋刺他，因事机不密而被捕。这可是满门抄斩的不赦大罪，传奇的是，专案组组长、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，却对这位用“精卫”之名在报纸上激烈抨击政府、在行动上采用恐怖主义的年轻人大加欣赏。最后，这位日后以汪精卫而著称的“恐怖分子”，因“误解朝廷政策”，只被判了无期徒刑，并在狱中享受到了相当的优待。小汪逃得性命，固然与肃亲王有关，但如果

没有作为一把手兼受害人的摄政王点头，汪精卫那首“慷慨歌燕市，从容作楚囚；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的狱诗，就只能当作烈士诗抄而流传了。

如此谋逆大罪，不杀一人，载沣所体现出来的，不光是胸怀，也是其韬略及手腕：杀了一个汪精卫，会有更多的后来人，莫如示人以宽。这即使只是手段，没有胸怀也难以付诸行动。

这段故事，在充满阴谋和血腥的中国近代史中，无疑是洋溢着古典浪漫情调的佳话。而载沣的宽容，在此前此后的执政者当中，更是绝无仅有的另类。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，载沣毕竟为整个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“转制”。

1906—1911年6年政治体制改革，尤其是1909—1911年的三年宣统新政，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能发现：如果不是载沣的柔软身段，宪政改革将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；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（即使只是表面上的）将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得以建立；被革命者当作异族政权的清王朝，将不可能获得如此宁静的“安乐死”；同样被革命者当作“鞑虏”要予以“驱除”的爱新觉罗家族，将更不可能赢得“软着陆”的善终奇遇。

五

恭亲王奕訢逝于戊戌年（公元1898年），葬于昌平麻峪村。

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于恭亲王奕訢的评价很高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（Arthur Henderson Smith）在其著作《中国在激变中》中认为，恭亲王的逝世，令中国这架“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”。大清国的洋干部、美国人马士在他那本著名的《中华帝国外交史》中认为：“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，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。”《泰晤士报》驻华记者濮兰德（J.O.P. Bland）认为“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……如

果他还活着，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”，这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后，西方人的普遍观感。

每次归国进京，只要时间许可，我都会做两件事：一是去麻峪村凭吊恭亲王，二是去植物园凭吊梁启超。每次我都会在他们的墓前沉思良久。

老恭王的墓地，早已被毁坏。这些年，我的几位挚友都在努力追踪寻访老恭王的遗骨，颇有进展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在毓蟾先生病危时，我去医院探望他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。

遗憾的是，与毓蟾先生每次见面，光顾着听他讲各种故事，很少问及他对当时政事的看法。不过，以他历经政治运动的个人惨史，臧否政事大约也早已不是——准确地说“不敢是”——他的兴趣所在了。

六

格格弥补了她大爷的这个遗憾。

格格的这本处女作，其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：这是爱新觉罗后人第一次直面其家史、国史，而不仅仅是提供“口述历史”。

我知道格格一直在收集、整理家史资料，这是一个相当艰苦、孤寂的工作。我相信随着格格对家史资料的深入挖掘，今后会推出更多的有独特视角的著作，帮助我们更深地解读爱新觉罗这部鸿篇巨制。

两个世纪来，每逢戊戌，似乎都有巨变。今年（公元2018）又逢戊戌，我在中秋之夜填了一首七律，既是自况自嘲，也是对恭亲王的缅怀：

杯酒汪洋起怒涛，
江山无奈一肩挑。
醉卧桂下逗玉兔，

醒执弯弓射大雕。
谁言擎天丈夫业，
莫若画眉嫦娥娇。
摘星揽月游戏事，
俯看九重未觉高。

雪珥

2018年12月31日于香港维多利亚湾

就我们目前的经验来看，时间是单向的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：已经发生过的历史，我们没有机会再次亲历目睹，因此解读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，并期望从中得出结论变得困难重重，还原历史真相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话说回来，即便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事情的亲历者，从不同的角度也能得到不同的结果。很多时候，多一个角度，就多了一分接近真相的可能。我想，这正好给了我重新解读中国近代史的理由。

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，中国的历史有着非常独特的走向；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，清朝的历史本身也极为特殊。跨入近代，中国的清朝更是面临这片土地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极大变局。了解这一变局的始末，特别是了解这一变局的当局者的所作所为、所思所想，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我能在这件事上有所作为，对我而言，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我的高祖恭忠亲王爱新觉罗·奕訢出生于1833年。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，他还是一名在上书房读书的小皇子，关于这个历史转折点，他最

深刻的记忆，莫过于皇帝父亲的忧心忡忡。1850年，父皇宾天，他被封为亲王，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，随着战事的日益吃紧，他的皇帝四哥打破亲王不得任职军机处的祖制，任命他为军机大臣。第二次鸦片战争，皇帝北狩，他被推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。紧随其后的是两宫垂帘、亲王辅政，他作为总策划，极力推进洋务运动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皇朝中兴——同光中兴。他一生三落三起，最后一起是在同光中兴的最后一年，也是惨烈的甲午战争那一年，此时的他，如同他身心系之的家天下，早已沉疴难起，无力回天。

一代忠王之后，他的儿孙粉墨登场。我的曾祖父载滢也因一个“壮举”被历史记住：和另外三个载字辈的家族成员，率领60多名义和团“兄弟”，冲进瀛台，准备弑君。审视这场轰轰烈烈、震动朝野的闹剧，能带给我们很多思考。

“有我溥伟在，大清不会亡！”在诸多事后诸葛亮看来，这只是又一场闹剧。如果放在两千年前，这何尝不是又一曲慷慨悲歌呢？所谓造化弄人，便是如此吧。我的爷爷第二代恭亲王溥伟，经历了逊帝退位和军阀混战，于毁家纾难念念不忘，可惜并无回响，最后成为侵华日军的一枚弃子，于1936年郁郁离世。

1833年到1936年，百年近代史，同时也是百年家族史，相互交织，相互影响，相互留下深深的烙印。观之思之，每每让人感慨唏嘘。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，我对这段历史的感觉与旁人又是有些不同的。

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正是这份与众不同的感觉让我痛苦万分。那是一个个人面对一个大时代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，我不清楚这种感觉是来自于我自己还是我的祖先们，如果他们也曾经历过这种感受，却没有被它们所吞噬，那无疑是因为他们比我强大得多；我面对它们的时候，只能任凭它们拨弄我的神经、捶击我的心房，直到连气都喘不上来。这种痛苦最终让我选择了逃避。

后来，我尝试着让自己抛开这个事实，用绝对中立的角度来看待这些

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。但是这种努力仍然是徒劳的。他们是我的亲人啊，我怎么可以冷眼旁观？凝视着他们的照片，阅读着他们的文字，想象着他们的样子，他们是让我思念的亲人。属于他们的那一段历史早已远去，我却总觉得心有不甘，不甘他们被尘封，不甘他们被误解，不甘他们被对他们毫无了解的人评头论足。作为他们的后代，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液，我觉得我有话想说，我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他们想通过我的嘴巴说出他们想说的话。

其实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呢？他们在他们的时代，说着想说的或是不想说的话。是时代选中了他们，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声音。他们说过的话，有的被记住了，有的被忘却了，有的被了解了，有的被曲解了，有的被放大了，有的被忽略了。他们又何曾在意过呢？

我只能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罢了。既然无法逃避，也不能做到全然中立，那就顺从于心吧。如果能另成一个角度，于解读这段历史有所裨益，那倒可以算作是意外收获。

因为“历史”的原因，中国的近代史是以1840年为时间线来划分的。这种把清史一分为二的做法极不科学，也极不严谨，对此，很多历史学家都有不同意见。考虑到大多数人的习惯，这里仍然沿用，并不代表我本人赞同这一划分标准。

我还很希望有那么一天，吾国吾民都能坦然面对我们的历史，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。不过我自己也清楚，这个愿望无异于痴人说梦，“还原历史真相”本就是一个伪命题，无论出于主观意愿或由于客观原因，过去、现在和将来，扭曲的历史会一直存在。

我悲观地认为，或许所谓吸取历史教训也会是，并将一直会是一句空话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会看到曾经的历史一而再、再而三不断重演。我们以为可以避免的，其实正在发生；我们以为已经走远的，其实还在身边。